

THEODOR W. ADORNO

HANNES EISLER

论电影 音乐

..... [德] 特奥多·阿多诺 [德] 汉斯·艾斯勒 著 刘斐 译



COMPOSING FOR THE FILMS

上海人民出版社

LUMINAIRE BOOKS
光启书局

[德]特奥多·阿多诺 [德]汉斯·艾斯勒 著 刘斐 译

Theodor W. Adorno Hanns Eisler

COMPOSING FOR THE FILMS

论 电 影 音 乐

上海人民出版社

LUMINAIRE BOOKS
光启书局

守望思想 逐光启航



论电影音乐

[德] 特奥多·阿多诺、[德] 汉斯·艾斯勒 著

刘斐 译

策划编辑 杨全强 杨芳州

责任编辑 余梦娇

营销编辑 池 淼 赵宇迪

特约编辑 玛 婴 廖 雪

装帧设计 董茹嘉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201101

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印张：8 字数：130 千字 插页：4

2023 年 1 月第 1 版 2023 年 1 月第 1 次

定价：68.00 元

ISBN：978-7-208-1662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电影音乐 / (德) 特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德) 汉斯·艾斯勒
(Hanns Eisler) 著; 刘斐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20

书名原文: Composing for the Films

ISBN 978-7-208-16620-2

I. ① 论… II. ① 特… ② 汉… ③ 刘… III. ① 电影音
乐—音乐创作—研究 IV. ① J6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39299 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21-53202430

作者

特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成员之一, 在文化工业研究及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领域力作甚多。

汉斯·艾斯勒 (Hanns Eisler, 1898—1962), 德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作曲, 师从勋伯格。1942年在好莱坞从事电影音乐创作。

译者

刘斐, 文学博士,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学术兴趣包括电影理论、流行音乐与社会思想史, 译文曾刊载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外国美学》等。

目录

新版导言 1

前 言 58

导 言 60

第一章 偏见与陋习 64

第二章 功能与戏剧性 84

第三章 新的音乐资源 98

第四章 社会学诸层面 113

第五章 美学元素 134

第六章 作曲家与制片过程 168

第七章 建议与结论 199

附 录 224

新版导言

格雷厄姆·麦卡恩 (Graham McCann)

只因他是人，
人得有饭吃，
他不会满足于夸夸其谈，
那可给不了他面包和肉。

布莱希特、艾斯勒^[1]

如今不言而喻的是，
关于艺术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更不用说没有什么是不思自明的。

阿多诺^[2]

[1] 布莱希特、艾斯勒 (Brecht, Eisler), 《统一战线歌》(*Das Einheitsfrontlied*, 1934)。——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原注。

[2] 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 C. 伦哈特 (Lenhardt) 英译, London: Routledge, 1984 年, 第 1 页。

1934年，好莱坞，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新电影——《救生艇》(Lifeboat)，正在二十世纪福克斯的片场拍摄。有一天，电影的作曲者得知，导演决定不在这部片子里使用任何音乐。作曲家感到很困惑。他陷入突然的不安，有些生气，想知道导演为什么会别出心裁。“是这么回事，”有人告诉他说，“希区柯克认为，既然整个剧情都发生在公海上的一艘救生艇里面，那音乐是从哪儿来的呢？”作曲家叹了口气，耸耸肩，听天由命地笑着回答说：“让希区柯克先生解释一下，摄影机是从哪儿来的，我就告诉他，音乐是从哪儿来的。”

音乐，始终是电影媒介中最少被欣赏到、最经常遭到忽视的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也还是最少被论及的方面。当《论电影音乐》在1947年首版的时候，就其对商业电影及电影配乐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本质特性与潜力的理解而言，乃是一份独特而极富挑战的贡献。今天，在汉斯·艾斯勒和特奥多·阿多诺着手其非凡计划的五十年后，作为对电影音乐之社会、政治、美学重要性的学理性分析，这部著作仍然卓尔不凡。你或许不同意其中的部分论点，但你仍然不难感受到它在面对一个很少被严肃看待的领域时，所展现出的罕见的批判性维度。它简练却野心勃勃，

大胆而充满启发，是一首丰富而诱人的序曲。两位合作者，艾斯勒与阿多诺，分别代表着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种传统：艾斯勒那种布莱希特式的艺术实践，以及阿多诺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两位作者都无视僵硬的学科界限，因此，阅读《论电影音乐》就意味着投身于美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和哲学性的问题与关切。这样说来，这本书算是出乎意料地清晰易懂的了。

汉斯·艾斯勒（1898—1962），用他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在一片至今仍被视作逃离政治的庇护所的领域内，为一种社会艺术铺就了道路”^[1]。他生于莱比锡，却在维也纳长大。他的父亲是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母

[1] 阿尔布莱希特·贝茨（Albrecht Betz），《政治音乐家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 Political Musician*），比尔·霍普金斯（Bill Hopkins）英译（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参见曼弗雷德·格雷布斯（Manfred Grabs）编，《汉斯·艾斯勒：乐界反叛者》（*Hanns Eisler: A Rebel in Music*），（Berlin: Seven Seas Publishing, 1979）。海因兹·约瑟夫·赫尔伯特（Heinz Josef Herbort），《汉斯·艾斯勒——一位异类的肖像》（*Hanns Eisler—Portrait eines Nonkonformisten*），*Die Zeit*, 1968年6月14日；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e Lukacs），《纪念汉斯·艾斯勒》（*In Memoriam Hanns Eisler*），*Alternative*, 1969年第69期；以及戴维·德鲁（David Drew），《艾斯勒与论辩交响曲》（*Eisler and the Polemic Symphony*），*The Listener*, 1962年1月4日。

亲是玛丽·艾达·菲舍 (Marie Ida Fischer)。他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的兄长和姐姐后来在柏林成为职业革命者。1919年，他开始学习作曲并成为新维也纳音乐学院 (New Viennese Conservatory) 的卡尔·魏格尔 (Karl Weigl) 的学生。很快他就厌倦了魏格尔因循守旧、要求不高的那一套教诲，于是，尽管缺乏资助，他还是开始跟随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önberg) 接受为期四年的私人教学，后者免除了他的学费。他被勋伯格的大师班接纳真可谓欣逢其盛，因为后者此时正处在从无调性向十二音作曲法转折的时期。艾斯勒成为继韦伯恩 (Anton Webern) 和伯格 (Alban Berg) 之后，尝试用新技法作曲的第一人。

他在政治上的激进倾向导致他与勋伯格发生冲突，1925年，在历经一个激烈对抗和反叛的时期后，他移居柏林，去追寻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主义音乐。他为共产主义者的合唱团与宣传节目创作过直白而音乐上却相当复杂的歌曲。作为一名投身战斗的作曲家，他后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写过好几首杰出的歌曲，包括人们非常熟悉的《第三国际歌》 (*Kominternlied*)、《歌唱学习》 (*Lob des Lernens*) 以及《统一战线歌》。受贝托

尔特·布莱希特关于政治艺术的理念影响，他根据布莱希特的文字编配过大量的剧场作品和清唱歌曲，还为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布莱希特和萧伯纳的戏剧做过配乐。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开始给电影做配乐，与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文化名流如电影导演沃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1]以及斯拉坦·杜多夫（Slatan Dudow）^[2]等人合作。他与左翼政治的牵连最终导致他永远地离开了德国。

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主持过一个为期不久的国际音乐办公室，并在维也纳、布拉格、巴黎、伦敦以及哥本哈根等地工作过，直到最终移民美国。战后他遭到驱逐，最初安顿在维也纳，继而，从1950年直至去世，他一直生活在东柏林，在艺术学院主办一个作曲大师班并为大型合唱团创作了一系列歌颂无产阶级国家的歌曲，其中包括前民主德国的国歌《德意志交响曲》（*Deutsche Sinfonie*）。

特奥多·维森格伦德·阿多诺（1903—1969）曾被称为“德国最杰出的学院教师和西欧先锋派

[1] 合作电影《第三章》（*Opus III*, 1924）。

[2] 合作电影《库勒旺贝》（*Kuhle Wampe*, 1932）。

的一位卓越公民”^[1]。他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身为独子，他的父亲奥斯卡·维森格伦德（Oscar Alexander Wiesengrund）是一个富有的归化犹太商人，其妻子玛丽娅·加尔维利-阿多诺（Maria Calvelli-Adorno）是天主教徒，一位生于热那亚的科西嘉歌手（在1938年流亡前夕，依照同事们的建议，儿子决定用母亲娘家的姓取代他的父姓维森格伦德）。^[2]由于音乐和智力上的早熟，他于1921年即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3]学习哲学、社会学和音乐，并于192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翌年，他前往维也纳，跟随阿尔班·伯格学习音乐。借助他的天赋和母亲的家族影响，阿多诺很

[1] 利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理论家》（*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eorist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89），第53页。也可参见马丁·杰伊（Martin Jay）异常清晰而简练的介绍性文本，《阿多诺》（London: Fontana, 1984）；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阿多诺导言》（T. W. Adorno Introduction），*Salmagundi*, 10—11（1969年秋—1970年冬）；库尔特·奥本斯（Kurt Oppens）等人，《关于特奥多·W. 阿多诺》（Über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8）；基里安·罗斯（Gillian Rose），《忧郁的科学》（*The Melancholy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78）；以及洛文塔尔书中的《关于阿多诺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Theodor W. Adorno）。

[2] 马丁·杰伊，《阿多诺》，注释第22，第168页。

[3] 又称歌德大学。

自然地也和勋伯格、韦伯恩、克里内克 (Ernst H. Krenek)、斯特约尔曼 (Eduard Steuermann)、考里施 (Rudolf Kolisch) 及其他现代乐派的代表人物建立起私人交情。不过, 他最亲近的人还是伯格, 对阿多诺而言, 这是一位介于勋伯格的现代性和马勒的乡愁之间的作曲家。^[1] 虽然他在 1927 年返回法兰克福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但还是跟维也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并且在 1928 年到 1932 年间主编影响颇大的刊物《安布鲁赫》(*Musikblätter des Anbruch*)。

他从 1931 年起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掌的教席在 1933 年纳粹掌权之后日益岌岌可危。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涯和生命历程, 阿多诺与艾斯勒同样也不例外。他极不情愿, 却只好离开故国。在余生中, 他将对他自己以及流亡者同伴们“被毁掉的生活”展开反思。在短暂栖身牛津默顿学院 (Merton College, Oxford) 之后, 他加入了纽约的社会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研究所最初在 1923 年于法兰克福建立, 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研究项目的理论基础, 但是在

[1] 参见阿多诺,《阿尔班·伯格》(*Alban Ber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这位阿多诺的老朋友 1930 年接任所长一职后，其前景发生了剧烈的转变。^[1] 霍克海默与共产党所秉持的历史观、科学主义和政治理论不同，他的研究所提出马克思主义应该忠于马克思最早的批判计划：一种针对当下的理论，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这样一来，研究所重新激活的马克思主义就

[1] 研究所关于“批判理论”的构想或许是在霍克海默 1937 年的文章中获得了最佳的表述，《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重印于马修·J·奥康内尔（Matthew J. O'Connell）等人所译《批判理论文选》（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2）。马丁·杰伊的《辩证的想象》（*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London: Heinemann, 1973）仍然是关于研究所最完备的历史记述。洛文塔尔《未被掌握过去》（*An Unmastered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一书中的“社会研究所”一章，是极具启发的第一手叙述，彻底澄清了很多经常性的误解。更进一步的背景信息，可参见戴维·海尔德（David Held）的《批判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1980）；尤金·朗恩（Eugene Lunn），《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Marxism and Modernism*, London: Verso, 1985）；罗尔夫·魏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法兰克福学派》（Cambridge: Polity, 1994）；以及马丁·杰伊，《永恒的流亡》（*Permanent Exil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研究所的文章，可参见安德鲁·阿莱托（Andrew Arato）与艾克·格布哈特（Eike Gebhardt）所编《精编法兰克福学派读本》（*The Essential Frankfurt Reader*, New York: Continuum, 1990）以及斯蒂芬·艾瑞克·布隆纳（Stephen Eric Bronner）和道格拉斯·麦凯·凯尔纳（Douglas MacKay Kellner）所编《批判理论与社会读本》（*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89）。

成为一种“批判理论”，坚决反对一切类型的教条主义，坚定地抵制将一般或特殊这二者中任何一个拜物教化的危险。由此，研究所致力于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规划，意在阐明社会、经济、文化与意识得以复制和变形的一整套机制。

研究所的理念与阿多诺本人那惊人且非正统的天赋若合符节。无论是在流亡美国期间还是在40年代回归法兰克福（此时他成了新任所长）之后，他的思想都构成了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计划的主导性影响。他坚守“不介入”的理念，不合作，拒绝以实际权宜的名义做出妥协。^[1] 他的思想抵制住诱惑，拒绝对任何不成熟的解决方案或是调和给予支持，努力保持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性。他曾经写道：“辩证法以极端的方式前进，以最大程度的同一性驱使思想臻达极点，在那里它们将背离而不是验证自身。”^[2] 他的风格就是摩擦传统思维的纹路，运用挑衅式的夸张和反讽性的颠倒以使矛盾获得清晰的呈现。“一

[1] 阿多诺曾在《论顺从》(Resignation)一文中对自己的这一立场做出过最为精确的辩护，该文重印于J.M. 伯恩斯坦(J. M. Bernstein)所编《文化工业》(The Cultural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1991)一书。

[2]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E. F. N. Jephcott英译，London: NLB, 1974年，第86页。

种思想的价值，”他评论道，“由它与熟悉事物的连续性之间的距离来衡量。”^[1]

“流亡者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写道，“是最敏锐的辩证法家。他们的难民身份是变化的结果，而他们的唯一研究对象就是变化。他们能够从最微小的暗示中推导出最伟大的事件……当他们的敌手获胜时，他们会计算出对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对于矛盾，他们拥有最敏锐的发现目光。”^[2] 欧洲移民的数量在1941年达到顶峰。在1933年到1945年期间，基于一项豁免条令，任何在之前两年从事教学工作而且已在美国获得教职保证的移民将不受限额的限制。借此，有613位学院中人移居美国。安置外国流亡学者紧急事务委员会（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为459人找到了职位，其中167人被安置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设立

[1]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E. F. N. Jephcott 英译，London: NLB, 1974年，第80页。关于阿多诺文体上的技巧，可参考助益良多的已有讨论，如基里安·罗斯《忧郁的科学》第二章，以及萨缪尔·M. 韦伯（Samuel M. Weber）《译不可译》（*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一文，收于阿多诺《棱镜》（*Prisms*, Cambridge, Mass: MIT, 1981）。

[2]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流亡者们的对话》（*Flüchtlingsgespräch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61），第112页。

的“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艾斯勒 1938 年初抵达此处,讲授一些音乐课程。就规模而言,新学院是当时在美移民学者们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不过,当时与移民知识分子有关的重要机构还不止这一处。^[1] 1934 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安排了一个北美总部。研究所的新址位于纽约的晨畔高地公园(Morningside Heights Park),由霍克海默主管,其研究特色突出地表现在阿多诺(他在 1938 年 2 月抵达,晚于其他人)、弗朗兹·诺依曼(Franz Neumann)、利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大家的著作当中,继续对政治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根源展开自觉的跨学科理论探究。

对于新的环境,阿多诺很不适应,他比其他同事的感受更强烈。“每个移民知识分子,”他后来写道,“都毫不例外地遭到了割裂,如果他想躲在紧闭着的自尊之门背后以免获悉这一残酷真相的话,那他最好是对此也抱有自知之明。”^[2] 尽

[1] 参见赫尔穆特·F. 普凡纳(Helmut F. Pfanner),《流放纽约:1933 年后的德奥作家》(*Exile in New York: German and Austrian Writers after 1933*,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第 33 页。

管他也加入了那些申请美国公民权的研究所成员的行列，但对定居美国却并无兴趣。事实上，利奥·洛文塔尔后来回忆说，阿多诺在加入他在美国的批判理论家同僚方面举动迟缓，以至于“我们几乎得动手去拽他”^[1]。他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欧洲人”，认为自己“身居海外的每一天都有此感，而且从未对此加以否认”^[2]。他的一位新同事注意到：“他看上去就像你能想到的那种心不在焉的德国教授，他的行为举止格格不入，像是那些五月花号上的成员一样。”^[3] 艾斯勒同样对美

[1] 洛文塔尔，文集《社会传播》第四卷，《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理论家》(*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eorists,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V.4), 第 64 页。

[2] 阿多诺，《一位欧洲学者在美国的学术体验》(*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收于唐纳德·弗雷明 (Donald Fleming) 与伯纳德·贝林 (Bernard Bailyn) 所编《知识分子移民：欧洲与美国，1930—1960》(*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第 338 页)。人们应该避免诱惑并拒绝那种一般看法，即把阿多诺看成一个“反美者”。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他在美国领悟到“一种真正慷慨好客的潜质，这在欧洲很罕见……美国人的生活中有一种朝向平静、温和与慷慨的内在冲动，这与德国在 1933 到 1945 年间激增并拥堵起来的怨恨与嫉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 367 页至第 368 页。

[3]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Paul Lazarsfeld), 《社会研究所历史上的一段插曲：一份回忆》(*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收于弗雷明、贝林,《知识分子移民》, 第 301 页。